

# 近期“郑和下西洋”研究综述

王 波 石亚琴 \*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郑和学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门显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郑和研究被赋予新的历史任务。本文从对“郑和下西洋”的重新定位、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郑和下西洋的多重保障因素等三个方面，对近年来的新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 研究综述

郑和在由政府组织的对外交往的船队中发挥了领军作用，成为几百年来学者研究讨论不断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随着不同的形势、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认识，每经过一次新的认识就会产生新的含义。改革开放以来，郑和学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门显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郑和研究被赋予新的历史任务。本文主要根据近年来的学者研究进行综述，介绍学者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 一、对“郑和下西洋”的重新定位

### （一）对西洋地理范围的重新认识

西洋是什么？中国古代文献一般指现在的东南亚海域加上印度洋的一部分。后来的不少学者就是根据这个定义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地域范围。而在近期的郑和研究中，将西洋的概念

---

**作者简介：**王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江苏商论》主编，正高级经济师；石亚琴，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

重新进行定义。有学者认为,西洋不仅包括东南亚海域,还包括印度洋的全部。特别是郑和以印度古里为根据地开辟了印度洋的5条新航线覆盖了整个印度洋,这样的航海态势此前一般人重视不足,认识不够,以致于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局限于以前的西洋地域概念。

万明重点强调要从整体上探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迹,这个整体就是扩大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理范围,将过去重视不够的印度洋整体纳入郑和舰队的贸易圈,从而使郑和的对外活动具有更广的空间和更大的尺度。他认为:按照马欢的表述,“那没黎洋”就是指西洋。……正是如今的印度洋。明朝时并没有印度洋的概念,印度洋是一个现代的表述。因此,“郑和七下西洋”就是“郑和七下印度洋”<sup>①</sup>。

郑和七下印度洋是以古里为根据地的。为什么以古里为根据地,因为从古里北上可以直达中国的西域,古里与中国的西域历史上有陆路相通,所以郑和选古里为船队的印度洋基地。郑和在第一次到达古里以后依托古里航行在整个印度洋上,万明认为:古里的地位从一开始的目的地逐渐变为中转站。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明确记载了以古里为始发港的五条航线,它们分别是:1. 古里至忽鲁谟斯国;2. 古里至祖法儿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佐法尔;3. 古里至阿丹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也门首都亚丁,是古代西亚宝石、珍珠的集散中心;4. 古里至刺撒国,有学者认为刺撒国在索马里附近,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也门沙尔韦恩角,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5. 古里至天方国,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元代称天房,《岛夷志略》称其为天堂,而这都是指克尔白<sup>②</sup>。

## (二) 对郑和下西洋历史意义的重新认识

基于西洋包括印度洋的整体认识,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也就有了新的提升,下西洋所达到的范围不再是局限性的部分海域而是到了洋际层面,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

南炳文认为: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意义都是堪称巨大的。在这大约一百年略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人与欧洲人先后从欧亚大陆的两端,分别进行了空前的向海洋的大进军,这一场大进军不仅显示了人类征服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折时期: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从此渐被彼此密切交往、人类渐成一体的状态所代替,与此相适应,人类的文明发达程度急剧提高,生产力

<sup>①</sup> 万明:《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型:基于明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新丝路学刊》2019年第1期,第1~16页。

<sup>②</sup> 万明:《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型:基于明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新丝路学刊》2019年第1期,第1~16页。

低下的古代和中世纪成为过去，高度发展的新时代向人们迎面走来<sup>①</sup>。

万明认为，其意义：首先是人类交往重心的转移：明朝时期派遣郑和下西洋进行大规模的印度洋航海外交，引领了全球史上一次重大转折——人类交往从印度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转折，……从“旧的海洋观”到“新的海洋观”的变化，是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移。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转型。其次是形成印度洋国际体系：实际上，通过15世纪初郑和的航海外交，中国将此前相对孤立的印度洋周边地区连接了起来，形成一个网络，这样就使印度洋国际关系体系化的过程开始成型。第三是第一次突破了海上千年封锁，实现了东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海路交流：从东汉甘英“临东海而望大秦”之后，中国对西域的探索就被安息帝国阻挡在了波斯湾。从此东西方交往的中心就被固定在了亚欧大陆，千年未变。……

（而郑和下西洋）此时明朝人对忽鲁谟斯的定位从西域到了西洋，这代表着明朝时期西洋和西域的全面贯通。万明进一步认为：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崛起，掌控了印度洋。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郑和下西洋之前，此后中国人改变了阿拉伯人称霸印度洋的局面<sup>②</sup>。

### （三）郑和下西洋的深入研究可以改变“集体记忆”

潘玥、肖琴等学者试图从旅游、艺术等角度重构历史记忆。她们认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航海业和东南亚宗教史带来深远影响”，这已是大众的集体记忆，并持续传承。但“记忆是主观的、感性的、多变的”，“即使是经过反复考证的史学记载，其真实性和全面性依然难以得到保证”。而重构历史记忆并非朝夕之事，可尝试从旅游和艺术等角度切入，重构历史记忆，将更深入人心<sup>③</sup>。而在郑和下西洋的学术研究中，她们认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要研究的领域不够完整，而大众易受主流信息影响，由此形成长期稳固的集体记忆。国内孔远志、马丽蓉、陈达生、廖大珂、肖宪等学者以及国外专家学者陈达生（TanTaSen）、黑达亚图拉哈（Hidayatullah）、阿赫玛德·法勿赞（AhmadFauzan）、戈达夫（H. J. deGraafdkk）、布迪曼（Budiman）、阿门（Amen）、迪马斯·约里亚·普德拉（DimasYulianPutra）等人认为郑和作为印尼乃至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者，对整个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传播造成了深远影响。而国内何萍、王涛、王华玲、张彬村等人分析了郑和下西洋时期与东南亚的经贸往来，但认为这是一段“失败的经济交往”，以致明朝国力衰弱。郑鹤声、郑一钧和科尼·翰达雅

① 南炳文：《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61～67页。

② 万明：《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型：基于明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新丝路学刊》2019年第1期，第1～16页。

③ 潘玥，肖琴：《“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历史记忆的重构——以郑和下西洋对三宝垄的经济影响为例》，《八桂侨刊》2019年第2期，第59～77页。

尼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对印尼经济和两国间合作带来积极影响。由此可知,诸多专家学者的分析,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集体记忆有限,且可能存在遗漏或偏误之处<sup>①</sup>。笔者按,通过郑和下西洋的深入研究,可以转变人们的集体记忆偏颇,使郑和研究走上正确轨道。

#### (四)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对世界的重新认识

天朝为上,四夷拱服是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但是,这种世界观在郑和下西洋以后得到了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加科学与合理。谢本书认为:中国传统的大陆观是地平大地观。中国在东亚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远离其他古典文明中心,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中心(中国)与边陲(四夷)的同心圆“天下”观。中国就是“四海之内”的“天下”。虽然,元代及其以前,中国的航海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开辟了一定的线路,东到日本,南到菲律宾,西至印度、波斯一带,然而对世界的认识仍是模糊的,老大的“天朝”的“中心”观,并未改变。郑和七下西洋,船队从不同的方向所到达的地方,是现在的伊朗湾上的霍尔木兹(中国古籍称作呼鲁谟斯),红海东岸的吉达(中国古籍称作秩达),还有非洲东岸的蒙巴萨(中国古籍称作慢八撒)等地。郑和最后一次远航,不仅有比较完整的航海记录,而且还留下了所经之地的航海图,这就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一是使中国人认识到世界是广大的、开阔的,还有许多我们尚未到达的、很不了解的地域,中国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天下”。二是发现了一些新的地区和领域,也可能包括澳洲和美洲。三是发现了一些未知的物产、文化和技艺<sup>②</sup>。

## 二、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

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收获也有经济收获,由这些收获所产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延越来越大。以前很多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以防止建文帝对朱棣的政权构成威胁。但是近期的学者在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政治影响时视界更加开阔,认识更加深入,范围更加宽广。同时,从历史资料看,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西洋地区进行经济贸易往来。中国人历来讲究平等交易,在郑和船队与西洋诸国的经济贸易中也贯彻了这一原则,所建立的朝贡贸易体系更是实现“厚往薄来的”原则。同时,郑和在经济交流中还注意友谊原则,“以德服人”,使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开辟了新的贸易

<sup>①</sup> 潘珩,肖琴:《“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历史记忆的重构——以郑和下西洋对三宝垄的经济影响为例》,《八桂侨刊》2019年第2期,第59~77页。

<sup>②</sup> 谢本书:《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再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0~113页。

局面。

### （一）郑和下西洋有更大的政治目的

陈尚胜认为：就寻找建文帝的目的而论，有的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耗竭巨资，遍历亚非三十余国，其长年累月、不惜代价而又漫无涯际搜寻，如果说仅仅为了一个‘仁弱’的建文帝的失踪，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而且，“纵然建文有出亡之可能，胡滢出访有踪迹之嫌疑，胡滢连夜被召见，漏下四鼓乃出。推而论之，则郑和至少在下西洋归国后也要叩见永乐帝才对，又为何六次下西洋连一次也未进见？甚至第二次尚未返回，便有第三次下西洋之诏，岂有不闻不问，不得确讯而再令出使之理。而且，即使是密敕，当也不能光靠郑和亲自察访，其随员也应知道一二，为何费信、马欢、巩珍辈却只字不提，更不用说朱棣是否会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六次地派郑和大张旗鼓地在同一地区寻找建文帝<sup>①</sup>。”

因此，陈尚胜认为郑和下西洋有更大的政治目的：明成祖之所以积极推行“遣使四出招徕”的对外政策，是与他缺乏政治权威相关的。我们知道，朱棣是以一个领有北边军权的藩王通过武力而登基成为明朝皇帝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登基完全不合封建正统、法统和皇统。按照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他的起兵“靖难”行为纯属犯上作乱；按照其父皇亲自制订的《大明律》，他的行为又完全属于“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而依据其父皇遗诏所写：“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行事。”（《太祖本纪》）朱棣却举兵南下，也属弥天之罪。因此，当朱棣至京师称帝后，有继续“练兵勤王”者，有登朝行刺者，有被缚后却以浩然之气对他责骂者，更有殉节而不肯与他合作者<sup>②</sup>。所以，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为了利用外部的政治影响来加强国内的政治权威。这是一方面。

对此，周炜琦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一次和平实践，其目的并非为追求经济财富，而是为了宣扬大明帝国威望，传播中国政治道德理念，建立“共享太平之福”的世界。明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应对国内矛盾，空前强化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主张外儒内法，即以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仁政为外在表现，以法家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根本，极力推行程朱理学，通过天理论、道统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构建起庞大的理论体系，用以进行思想统治。郑和所采取的积极外交政策使明朝在东南亚的政治地位凸显，充分体现了“天朝礼制体系”和仁政的管理理念。因此，郑和七下西洋最大的收获也就在于政治

① 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74～80页。

② 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74～80页。



收获<sup>①</sup>。

葛剑雄也认为：用今天的眼光看，郑和航海的目的显得片面甚至可笑。特别是从物质利益衡量，明朝既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回报，也没有增加属国和势力范围，更没有建立殖民地。但这一结果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当时的现实需要<sup>②</sup>。

何芳川认为：中华为礼仪之邦，礼乐文化是它在精神文明的最高体现。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就是希望将这种最高境界的礼乐文明广为流播。即所谓：“东沧海而西昆仑，南雕题而北穷发，无有远迹，莫不尊亲玉帛，会车书同，兴太平之礼乐。”……明成祖永乐大帝这种追求尤为强烈，“恒遣使宣敷教化于海外诸蕃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这就是所谓“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显然，“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就是要用中华那一套礼乐文明、儒家伦理道德，去影响诸国，促进其文明化<sup>③</sup>。

## （二）和辑、安定西洋区域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西洋地区不少地方还处于没有开化或半开化的状态，因此产生了强欺弱、大压小的民族不平等现象。对此，郑和以中华儒家的封建礼法制度进行教化，重点是建立和平秩序，和辑、安定西洋区域并取得成果。

陈平平、孙美姝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之一就是）维护区域和平。洪熙与宣德前期，海外某些国家之间的矛盾趋向尖锐。如《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记载，宣德六年二月壬寅（初七），满刺加国头目巫宝赤纳等来京，向明宣宗朱瞻基求援：“国王欲躬来朝贡，但为暹罗国王所阻，暹罗素欲侵害本国，本国欲奏无能书者。今王令臣三人潜附苏门答刺贡舟来京，乞朝廷遣人谕暹罗王，无肆欺凌，不胜感恩之至。”朱瞻基遂命巫宝赤纳等随郑和船队回国，并令郑和敕谕暹罗国王：“朕主宰天下，一视同仁，尔能恭视朝廷，屡遣使朝贡，朕用尔嘉。比闻满刺加国王欲恭来朝、而阻于国王，以朕度之，必非王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远虑，阻绝道路、与邻邦起衅，斯岂长保富贵之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郑和在两国之间进行斡旋，说服暹罗国王，放弃了侵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使团船队代表大明王朝出面调停争端，改善了多国之间的关系，维护了相关地区的和平<sup>④</sup>。

① 周炜琦：《大航海时代初期中葡两国发展趋势初探》，《科技风》2019年第1期，第204～205页。

② 葛剑雄：《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中国文化》2004年第1期，第15～18页。

③ 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50～56页。

④ 陈平平，孙美姝：《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使命与贡献》，《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第48～54页。

陈尚胜认为：明成祖就曾在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之际，对谋求东南亚地区霸权的暹罗国王进行了严厉警告：“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特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显有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刺、满刺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保境，庶几永享太平。”而郑和率兵出使，无疑也有明成祖显示“力”的意图。郑和本人就曾承认：“及临外邦，……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清宁<sup>①</sup>。”

对此，陈尚胜认为：“使远邦异域各得其所”是明成祖模仿古代“圣帝明王”“以德服人”的外交行为，也是郑和等使节在海外“宣德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郑和以及当时明朝其他使节在出使海外过程中，对一些国家之间关系的调解立场和敦促他们相互睦邻的行为，即本于这种“一视同仁”的道德外交。……为了维护这种“以德服人”的外交政策，郑和有时也对具有政治野心的国家使用武力，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中的“以力服人”。而对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则给予经济奖励，就是“以财略人”。“德”“力”“财”相济政策构成了郑和和平外交的完整内容<sup>②</sup>。

笔者按，郑和下西洋采取的和平外交方针，使原先相对落后的西洋地区有了稳定的和平发展环境，建立了一种和睦共处的政治秩序，完全不是一些西方学者所宣扬的建立世界霸权。可以断言，即使明朝政府在郑和之后再也没有组织过庞大的下西洋活动，但是仅凭郑和“以德服人”的政策，整个西洋地区也会由于中华文明的影响逐渐走上文明富强之路。后来西方的入侵，打断了西洋的近代化进程。

### （三）加大了对海权的认识

谢本书认为，郑和下西洋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易于忽视的重要问题：郑和七下西洋，不断升华了海洋意识，并且明确提出了海权观念，这在5个多世纪以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郑和在与仁宗朱高炽的谈话中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的海权观，其内容和现代海权观内容基本相符，但要比近代海权论的倡导者、美国人马汉的“海上权力论”要早近500年之久。郑和的这种海权观，使其热爱海洋，发展航海事业，沟通世界，扬我中华的同时，也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sup>③</sup>。

① 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74～80页。

② 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74～80页。

③ 谢本书：《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再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0～113页。

笔者按,郑和的海权思想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600多年前郑和就认为,南洋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南洋的安定和稳定,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我国现在非常关注南洋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定,非常重视与南洋地区各国的友谊,提出包括南洋地区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力求共同发展,和衷共济。

#### (四) 宗教建设和影响

西洋地区历来是各种宗教衍生繁育的区域,为了教义,不少民族相互战争,使西洋一些地区陷入冲突之中。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目的就是使西洋地区的各种宗教和平共存,因此,他在西洋宗教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潘珩、肖琴认为:不少学者将郑和与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紧密联系,阐述郑和对印尼以及整个东南亚伊斯兰教发展的贡献,甚至有学者认为,印尼的伊斯兰教来源于郑和的家乡云南。由此可见,中国穆斯林郑和对印尼宗教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成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sup>①</sup>。

陈尚胜认为:从郑和使团在锡兰山国所树立的一块宗教石碑情况看,明朝也有与锡兰山国内各种宗教势力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1911年,锡兰岛上的加勒曾发现一块当年郑和在锡兰山佛寺布施所刻的石碑。根据当时参加西洋之行的费信记载,这块石碑是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预先在国内刻制的,并运至锡兰佛堂山(位于距加勒四十英里的德旺德拉)树立。不知何因,这块石碑竟被发现于加勒。在加勒发现的这块石碑的所署日期正好为永乐七年二月初一日,其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十分令人惊奇的是,这块石碑上三种文字所书写的内容虽在供物的名单上大致相同,但所颂扬的神的对象却不一样。汉文中书写有:“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园明广大……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苧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而泰米尔文则是说,明朝皇帝听说特那瓦莱、那亚尼耶尔等印度教神祇的名望,为了表示对其赞扬而建立了石碑;另外,波斯文则写着对阿拉和伊斯兰教圣人们的颂扬。这一碑文上的三种文字及其内容有别的情况表明,郑和使团不希望因为各种宗教的对立而影响在西洋的航行。郑和使团的这种做法,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而这种对“和”的追求,在本质上与“以德服人”的主旨相近<sup>②</sup>。

① 潘珩,肖琴:《“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历史记忆的重构——以郑和下西洋对三宝壟的经济影响为例》,《八桂侨刊》2019年第2期,第59~77页。

② 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74~80页。



### （五）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地区的生产生活技术交流

郑和下西洋并非完全从经济收益出发，更多得是将中国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交流给西洋的国家和地区。在15世纪，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的生产技术远远高于西洋诸国。为了推进中国与西洋地区的经济交流，使西洋地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郑和将大量先进的中国生产技术输入西洋，改变了西洋的生产状况。这些生产生活技术集中体现在建城、造屋、挖井、修路等方面。

在建城方面，郑闻天认为：当时一些海外国家，特别是那些南洋岛国，尚没有建筑城市，也不懂筑城居住。郑和官兵如要在此建立航海基地，就需要筑城而居，以保安全，满足生活和公务的需要。如郑和船队在满刺加建有航海基地，筑城而居。据马欢记载：“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据许云樵于1933年发表的《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记载：“据说满刺加人是从郑和那里学会建筑城市……的本领<sup>①</sup>。”

在建屋方面，郑和船队不仅做出样子，还主动帮助当地人：当时东南亚一些国家尚没有用砖瓦建房，而是搭建简易的茅草房。如占城国“民居房屋用茅草覆盖，檐高不得过三尺”；爪哇国“国人住屋以茅草盖之”，“屋上用硬木板为瓦”；满刺加国“房屋如楼阁之制，上不铺板，但高四尺许之际，以椰子树劈成片条，稀布于上，用藤缚定，如羊棚样”，如此等等，居住条件十分简陋。郑和一行来到这些国家，将中国的房屋建筑技术传授给他们，弃茅草木板而用砖瓦建房，使他们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其遗迹曾保存了很长时间。为中国城市和房屋建筑技术传入这些海外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sup>②</sup>。

在交通方面：当时南洋一些土著居民地区的交通状况极为落后，既不知道可以按需要修建比较宽阔、结实、定向而便捷的道路，又不懂得如何建筑这样的道路。郑和船队来到这种历来未曾开发的地方，没有正规的大道可供人数众多的官兵通行，官兵们就需要伐林筑路、甚至凿山开路，才可向目的地前进。在郑和一行颁给海外各国的历法及历注中，记载有“平治道途”“开渠穿井”等事项，郑和官兵会征用当地居民协助筑路，同时教给他们筑路的技术<sup>③</sup>。

郑和船队还传授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其生产效率和产量。……还颁以中国先进的历法和度量衡规制，如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二年（1404）九月辛亥（十三日），暹罗国王……乞赐量衡，俾国人永遵法式。从之。”这对促进海外国家天文历法和度量衡规制的

① 郑闻天：《论郑和航海时期的中国海洋外交》，《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第114～123页。

② 郑闻天：《论郑和航海时期的中国海洋外交》，《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第114～123页。

③ 郑闻天：《论郑和航海时期的中国海洋外交》，《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第114～123页。

进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所有这些,大大改善了东南亚落后地区的生活条件,使当地民众共享中国先进科技带来的利益,这样海外诸国就更愿意向中国靠拢<sup>①</sup>。

至今,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影响还在发挥作用。如潘玥、肖琴认为,在旅游方面:首先,每年农历6月29日(或6月30日),三宝垄市将隆重庆祝三保大人出巡日(Sembahyang Sam Po GiaHio)。近年来,这一节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到三宝垄旅游,许多华人和印尼原住民来到三宝垄旅游,参加三宝垄各地点举行的各种活动,如郑和研讨会、舞龙和舞狮等。其中,三宝庙是最负盛名的景点,“三宝庙的重建,被认为是那个时期对郑和与中国贸易恩典的承认。”它不止受到华人的参拜,也有不少印尼人乃至东南亚各地区和西方人民来朝拜。三保大人出巡日这一节日实际上扩大了三宝垄市的知名度,吸引了诸多国内外游客到访,促进了三宝垄交通业、旅游业、酒店行业、饮食业等辅助行业的发展。其次,自2015年起,印尼旅游部开启新的旅游路线,名为“重走郑和路”(Wisata Jalur Samudera Laksama Cheng Ho)。游客可搭乘一艘郑和宝船的复制品,探访当年郑和曾经到访的印尼城市,包括泗水、巨港、邦加勿里洞、三宝垄等城市。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下,这一旅游线路应运而生,吸引了众多游客<sup>②</sup>。

#### (六)对朝贡贸易体系的新认识

南炳文认为:(郑和下西洋)其结果带来了中国先进文明之向外传播、中外之经济交流和亚非地区的国际和平安定局面。各国皆得受益,中国也能得到好处,除中国天子享受万国来朝的荣誉外,还使中外互通有无,满足了以皇帝为首的上层人物对海外奇珍的需求。但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造成了财政的紧张,物力不继,有碍强盛国力的保持,因而不可能永远实行下去<sup>③</sup>。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新的看法,杜君立认为:按照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郑和下西洋因为经济上的失败而最终被放弃,但如果考虑到香料经济的暴利,那么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论断。毕竟郑和下西洋并非一次两次,而是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七次。至少在早期的几次远航中,郑和船队是名利双收的。史料中也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而奢侈品“国用充足”。郑和多次下西洋,从海外带回大量的香料,这些香料常常被当作珍稀的中药材使用。郑和船队采购的商品中还有一种叫苏麻离青的矿石,它产于中东,是制造青花瓷器所必须使

① 郑闻天:《论郑和航海时期的中国海洋外交》,《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第114~123页。

② 潘玥,肖琴:《“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历史记忆的重构——以郑和下西洋对三宝垄的经济影响为例》,《八桂侨刊》2019年第2期,第59~77页。

③ 南炳文:《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61~67页。

用的一种青色调料，在中国非常稀缺昂贵<sup>①</sup>。因此，郑和下西洋在经济上并没有吃亏，而是在多方面得到补足。

赵伟也认为：“朝贡贸易只是笼络其他国家的一种手段，主要出自政治目的，本身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从“朝贡”和“赏赐”的不对称来看，这种贸易活动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明朝政府所付出的远远大于所得到的，朝贡贸易只是为政治服务。……明帝国终止下西洋的原因，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如有海禁说以及上述所言的耗费极大国力难以支撑等说法。万明《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一文中，对这些说法提出了质疑，著者认为下西洋终于海禁说、耗费巨大及物力不支说、难以为继说等不能成立，至少都是以偏概全<sup>②</sup>。

杜君立认为：通过郑和带回的香料等异域奢侈品，人们发现海外贸易利润之高，远非国内生意可比，甚至高达几十倍上百倍，这必然刺激了民间进行航海贸易的冲动和热情。郑和以后，私人商团纷纷下海，华人遍布整个东南亚，使明朝的海禁名存实亡。因为所谓的海禁法令，国家不能合法征税，走私贸易利润非常可观<sup>③</sup>。

至于朝贡的国家，徐晓望认为：在郑和七下西洋时代，南海及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较为安全，周边国家的往来更加频繁。到明朝来进贡的国家，先是南洋国家，而后有印度洋国家加入，再后，西亚的和东非的一些国家也到中国进贡。在郑和及其同僚的大航海时代，中国与南海国家的交通空前频繁。据郑鹤声、郑一钧的统计，明朝洪武年间，来自南海各地的使团计 183 次，永乐年间，来自南海的代表团计 318 次，洪熙年间 10 次，宣德年间 79 次，正统年间达 104 次，明初五个朝代共计 694 次之多。明宣宗时，明朝在海外的威望达到高峰。“伏睹皇明自太祖开业垂统，太宗、仁宗继宏，功德益远益隆。传至皇帝陛下，尤勤于任贤，急于劝职，以恢鸿图，以致环海内外，悉义悉和，旁洽百夷，遐荒莫不宾来易。所谓万国咸宁，诚惟今日为然也。”可以说，明代前期中国已经建立了所知世界的朝贡体系<sup>④</sup>。

同时，郑和下西洋也对中国的商品输入和南洋的商品输出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自从郑和下西洋开辟了太平洋、印度洋海上航线以后，虽然官方终止了朝贡贸易，但是民间的海外贸易反而更加发展起来，潘珣、肖琴认为：郑和下西洋前，定居在爪哇岛的华人群体以广东和福建漳泉人为主，自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海上航道之后，七下西洋的航线遍及整个东南亚、南亚与非洲，中国商人开启了漫长的“下南洋”经商之路，两国间的国际贸易日益增加。

① 杜君立：《香料：郑和的秘密》，《文史天地》2018 年第 6 期，第 54～56 页。

② 赵伟：《下西洋：明朝前期的开拓与内敛》，《东方论坛》2018 年第 1 期，第 54～61 页。

③ 杜君立：《香料：郑和的秘密》，《文史天地》2018 年第 6 期，第 54～56 页。

④ 徐晓望：《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朝构建大同世界的梦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 12 期，第 94～99 页。

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等沿海地区的商人，随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从各港口造访印尼，购买当地沉香等物，这开辟了中印尼国际贸易的途径。其中，中国的陶瓷和印尼的香料是期间主要的贸易产品，成为连接中国与印尼、东方与西方之间贸易网络的基础。随着大量中国商人“下南洋”，更多的华人来到印尼经商，利用印尼这个大港口的优势发展印尼与国内贸易，并延伸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各个地区和国家，带动了沿途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使不限于香料的印尼商品迈向世界，打开国际市场，为开辟国际贸易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这种影响还存在：（导致）华人公司的壮大。印尼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海外华人，印尼华人有经商的传统，其中印尼十大富豪中有八位华人。他们的产业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并都是各行业中的佼佼者<sup>①</sup>。

徐晓望认为：郑和航海归来，带来大量的钻石、宝石、珊瑚、黄金，海外奢侈品，大都是供给皇室消费，例如湖北省钟祥市郑和时代的梁庄王墓出土大量的金银珠宝，其中一块金锭上刻：“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五十两重。”说明这块金锭是郑和从西洋购得。全墓出土的金银玉珠饰器件达5100余件，仅宝石就有700多颗。其中墓主人的一条金腰带上镶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等宝石达84颗，专家认为，这些宝石主要来自海外。王室如此，皇室的豪华更不可想象。此外，从事居间贸易的商人获利也多。明朝在朝贡中获得的海外奢侈品除自用之外，多数由商人承包销售。大量东南亚香料、珠宝流入市场，也活跃了商业经济。如杨荣说福建：“岁时诸番宾贡，海舶珍奇之货，率常往来于此。”正如严从简所说：“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总之，郑和时代的海上贸易给皇室和民众都带来了好处<sup>②</sup>。

### （七）传播中华医学文明

姜聪颖、张龔真认为：东南亚地区常年温度较高，物种繁多，水源丰富，急性传染病很有可能通过水源传播，危害百姓生命。郑和船只沿岸航行，在方便两国进行贸易交往的同时，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水源分布情况，因地制宜，救治病人。清代陈伦炯《南洋记》记载：“暹罗番病，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人唐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在《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多次提到郑和航行经过东南亚国家时，在所到处掘井，传授当地人挖井技术，并向水中撒有药物，使患有疾病的居民用此水清洁伤口，随后身体痊愈。如满刺加有一口井，名叫“三宝井”，是郑和巡视南洋路过马六甲所掘，井水清冽甘美，

① 潘珩，肖琴：《“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历史记忆的重构——以郑和下西洋对三宝垄的经济影响为例》，《八桂侨刊》2019年第2期，第59～77页。

② 徐晓望：《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朝构建大同世界的梦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12期，第94～99页。



饮之除病延年；有些地方居民于十月十五日取水，据说郑和每此日下药于江河，若在此汲水，久藏不坏。“吉令”（印度侨民）生病时，常向郑和船队医官求医治，郑和让他们把牛尿涂满全身，随后在太阳底下暴晒，身体便会康复，即使现在医学如此发达，当地居民还仍然坚持使用此方法。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还流传郑和用榴莲为当地居民治病的传说<sup>①</sup>。

在饮水卫生方面：（当时东南亚地区）如附近有河流溪涧的，就是水源；如不靠河流溪涧，就用芭蕉叶接雨水，储存备用。（郑和因此）教给当地土著居民掘井取水的技术。如在印度尼西亚“距茂物约五里，有一所地方，名叫三宝井，听说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古迹。……太监（指三宝太监郑和——引者注）于闭关时代，交通不便，往来跋涉，……周游南洋群岛，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抚慰土人；又所至皆有遗迹，凿山开路，掘地取泉，至今英荷二属均有三宝井留存，这种豪举，殊令人佩服<sup>②</sup>。”

同时，郑和一行在各国访问时，还给当地民众医疗治病，有文献记载，郑和携带接生人员，时称稳婆：按照古代运兵运货船只的规定，女性是不能够上船的，然而郑和却无视这种惯例，携带稳婆航行。明朝国力强盛、人口众多，当时在各国人口排名中属于前列。人口的持续增加是明朝中医妇产医学系统发展完善的有力证明。因东南亚国家在当时医学发展水平还处于较落后的状态，如当地妇女生孩子，常用锋利的碎石割破脐带，但碎石上常带有细菌，因而容易引起破伤风等疾病，导致死亡。郑和船队在到达目的地后，让稳婆为当地人传授接生经验，提高当地医疗水平，促进了中医妇产医学在世界的发展<sup>③</sup>。

郑闻天认为：海外国家的民众都盼望郑和船队来访，好借此机会与郑和船队交易，获得他们喜爱的中国丝绸瓷器等特产，或转手他人赚取利润，或用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如在爪哇，人们传统习惯于用椰子叶盛食，在获得郑和船队带来的大量瓷器后，就改用中国青花瓷碗瓷盘盛食，不仅方便了许多，生活质量也由此得到显著提高，他们自然“最喜中国青花磁器”了<sup>④</sup>。

在所带药物方面，姜聪颖、张龔真认为：郑和航海前，除精心挑选医术高明的医生外，还随船携带了大量的中草药及医书自用或与他国进行贸易，它们的医药功效对于中南亚国家的气候来说颇具针对性。如颜夏梅提出：“郑和船队出航时带有药物 300 多种，包括藿香、黄连、大黄、黄芩、龙胆草、巴豆粉、滇漆、血竭、麻黄、常山、诸葛行军散、开关散、黄土丸、卧龙丹、曲焕章白药等，其中有的药物如人参、大黄、茯苓、肉桂等数量较大。”以

① 姜聪颖，张龔真：《郑和下西洋与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2期，第58～64页。

② 郑闻天：《论郑和航海时期的中国海洋外交》，《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第114～123页。

③ 姜聪颖，张龔真：《郑和下西洋与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2期，第58～64页。

④ 郑闻天：《论郑和航海时期的中国海洋外交》，《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第114～123页。



上药物中,大多有除湿杀虫、清热泻火、化瘀止血、利水消肿、清热抗疟的功能。而东南亚地区气候潮热、物种丰富,疾病传播途径多,人易被蚊虫叮咬,患疟疾等急性疾病,加上当地卫生条件不完备,使民众常遭受疾病的痛苦。明代费信编写的《星槎胜览》一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的药物作为商品为东南亚国家人民所喜爱,此举丰富了东南亚国家药物的种类,对当地的传染性疾病进行有效的控制,促进了当地医药事业的发展<sup>①</sup>。

姜聪颖、张龔真还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医药文化的碰撞时是相互的,据史书记载,在航行过程中,郑和船队将西洋各国珍贵的药材引入中国,经过种植与栽培,其中大部分被后来医者广泛运用于医疗实践中,如白檀香、黄熟香、沉香、犀角、象牙、紫梗、燕窝等,此次举动丰富了双方药物种类,有利于彼此医学事业的发展<sup>②</sup>。

郑和下西洋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西洋一带造成广泛的影响。何芳川认为:在郑和时代,中华帝国与亚非诸国之间,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很大的。这样巨大的文明差距,使郑和船队大规模的访问对那些国家形成了巨大的文明冲击。各国纷纷遣使来华。其中,国王亲自率团来访者就有四国八次。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对中华礼仪文明倾慕之心至死无悔<sup>③</sup>。

笔者认为,其实从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经济实践和取得的成果来看,是以“和”为主。如郑和维护各种宗教的和平共处并不是单纯为了经济利益,从更深远的政治层次而言,首先是对西洋地区流传的各种宗教的尊敬;其次是通过这种尊敬来达到“以德服人”的政治目的;第三是通过各宗教的和平共处达到共同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说,郑和的这种宗教方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了历史的检验。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了一个商人文若虚利用一两银子的本钱通过海外贸易获得几万两银子,成为闽中富商。类似资料在《金瓶梅》《红楼梦》中都能看到,也能在当时的正史、笔记、地方志中找寻到。说明由郑和下西洋引发的外贸经商潮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造成民间的海外经商潮。至于医药技术等的交流,更是给中国和西洋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提高了双方的生活质量,尤其使南洋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① 姜聪颖,张龔真:《郑和下西洋与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2期,第58~64页。

② 姜聪颖,张龔真:《郑和下西洋与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2期,第58~64页。

③ 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50~56页。

### 三、郑和下西洋的多重保障因素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一般海船在 60 艘以上, 人员一般在 2 万人以上。如此庞大的船队远洋航行需要巨大的人、财、物保障, 这些保障涉及到船舶的制造保养、人员的选择募集、食品的准备贮藏甚至心理健康的防治等。没有这些保障因素, 一次出行几万里, 行程二三年是不可能的。因此, 对郑和下西洋保障因素的研究历来是郑和学的重要分支。近期有不少学者根据考古或文献资料的新发现对此也进行了新的研究, 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 (一) 人员的选择与招募

根据陈平平、孙美姝的研究,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使团船队由五部分人员组成, 组织系统严密: (1) 领导核心与行政管理系统人员。《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之署名: “宣德六年次岁辛亥仲冬吉日, 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 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 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显然, 这 11 人乃是使团船队的领导核心, 其有 9 人是太监。从排名次序看正四品的正使太监 2 名、副使太监 7 名, 均位于正二品的都指挥之前, 可见宣宗是以太监掌控使团船队。副使常统领分舵。少监、监丞、内官、内使等作为行政官员分别参与分舵、各舰行督察监军之责。(2) 军事系统人员。军事系统人员负责使团船队的安全保卫工作, 应对突发的武力冲突、确保胜利, 并担负多种劳役。《永乐十五年郑和於泉州回教先贤塚行香石刻》载: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 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於此行香, 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可见, 郑和作为历次下西洋排名第一的正使, 还是钦差总兵太监、使团船队的统帅、军队的首领。在其下依次为二位都指挥、众指挥、千户、百户、旗校、勇士、力士、军人等。军人在使团船队人员中占有绝大多数, 可见这是一支真正的远洋海军舰队。(3) 航海技术人员。火长即舟师, 为各船中指挥航海者; 舵工按火长指令操舵, 控制航向。班碇手负责起落船锚; 铁锚、木舵、搭材等匠负责船舶维修保养; 水手、民稍、余丁等负责升降船帆、摇橹、划桨、撑篙和船上杂务; 阴阳官、阴阳生等负责航海天文观测、海洋气象预报。(4) 外事系统人员。其正使、副使等主持开诏宣谕等大典, 负责外交谈判、外贸决策等。买办负责采购, 教谕负责文化交流, 通事负责涉外翻译, 舍人负责相关文字工作。(5) 后勤总务系统人员。户部郎中掌管钱财与后勤供应事务, 书算手负责会计出纳工作, 医官、医士负责医疗保健和防疫事宜<sup>①</sup>。

<sup>①</sup> 陈平平, 孙美姝: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使命与贡献》,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 年第 9 期, 第 48 ~ 54 页。

葛剑雄认为：明初丰富的人力资源中还包含着一批训练有素的船工水手。据《明实录》卷七十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征调“方国珍旧部”与沿海贫户“充船户者，凡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录各卫为军”。可以肯定，当时明朝军队中从事航海的人员至少应在11万以上，而散在民间的船户也不在少数。所以郑和要征集上万名船工，仅从军队中就能办到。即使连续出动，也能保证船的正常替补和轮换。从如此多的船工也可以推断，相应的其他人员如船舶的制造、维修、补给也相当充足<sup>①</sup>。

## （二）远洋船舶的制造

郑和七下西洋离不开远洋船舶的制造，船舶制造是历来郑和学研究的热门，但是因度量衡制度的变迁，研究者对船舶制造的尺寸分歧较大，近来南京洪保墓的发掘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新的史料，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殷洁对于郑和船队的规模依据这一最新的史料进行了考评，认为：船队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洪保于宣德六年与郑和、王景弘同为下西洋的正使太监，他的墓发现于南京江宁区谷里街道周村社区祖堂山南麓，是研究下西洋的重要考古发现之一。该墓于2010年由南京市博物馆及江宁区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11年列入第七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洪保墓内紧靠封门前出土方形石质寿藏铭一合，刻文保存较为完好，志盖竖刻篆书“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志文竖刻楷书共741字。开篇第一段“世居云南大理之太和”，根据周运中所著《郑和下西洋新考》分析洪保乃大理白族人，非前人误解的回族人。其中，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是“五千料巨舶”，做实了下西洋时所乘坐的船只的确存在五千料，说明了远航船只规模之巨大<sup>②</sup>。

徐晓望认为：近年南京发现永乐时太监洪保的墓志铭，其中说到：“永乐纪元，授内承运库副使，蒙赐前名。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这条史料突破了以往所知史料的局限性，表明郑和舰队顶级宝船至少是五千料级别的。于是，许多学者认为，洪保所乘五千料船舶，就是郑和船队最大的船舶。以我的方式推算，这类五千料大船约长十七丈，宽三丈三尺，还没有达到明代大船的极限。就明代史料的记载来看，明代是有万石船的。明初郑文康提到太仓殷九宰，“元任海道万户，家造三巨舶，大者胜万石，中者八千，小者六千。”此外，杜三策的册封舟和海述船的超级大船，至少是万石（料）船，甚至是两万料（石）级的大船。这些都证明明朝是可以造出万石船的<sup>③</sup>。

① 葛剑雄：《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中国文化》2004年第1期，第15～18页。

② 殷洁：《明代南京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研究综述》，《学海》2019年第6期，第157～161页。

③ 徐晓望：《破译“料”与郑和宝船的尺度》，《学术评论》2018年第1期，第12～21页。

葛剑雄认为：航海是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的集中表现。据《明史》等记载，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资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对郑和航海的规模，历来并无疑问，这充分显示了明初的国力<sup>①</sup>。

### （三）航海技术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偶然为之或者心血来潮，它是建立在中国与太平洋、印度洋各沿海国家长期交往的基础上，是历史上航海技术的集大成，这个大成包括中国的航海技术和西洋的航海技术，通过技术的集中使用，保障郑和下西洋的成功。

葛剑雄认为：郑和航海是中国航海事业和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宋元以来航海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外开放、中外交流的必然产物。<sup>②</sup>

陈晓珊认为：从相关记载来看，“更”这种短时段计量单位是在《郑和航海图》之后才在中国航海书中普遍出现的。曾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巩珍，在宣德九年（1434年）的《西洋番国志·自序》中提到：“要在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必达其所。”这是有具体纪年的中国最早提到航海中“更”的文献。中国古代航海者很可能是在印度洋海域学到了用短时段代表航程的方式，并将其改造成符合中国传统计时习惯的“更”，类似技术和计量单位的最初交流和使用可能始于或略早于郑和下西洋时期，但它在中国民间的广泛流传和普及，是郑和下西洋之后才出现的。……而宋代以后中国航海者常用的测深铅锤，……原型是古代埃及人用铅锤测量土地，后来沿用到航海中，古希腊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已有使用这种测深锤的相关记载<sup>③</sup>。可以看出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航海技术水平出现了全面提升。

### （四）远洋基地

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航海中，采取建立基地的方法来实现区域全覆盖，郑闻天认为有四大基地：在漫长辽阔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郑和船队建立了四大海洋交通中心站——满刺加、苏门答刺（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小国，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北端东海岸的萨马朗加河[Kreung Samalang]口内的萨马朗加）、锡兰和古里。在满刺加和苏门答刺都设有航海贸易基地“官厂”。四大海洋交通中心站成为郑和船队及其分支船队分头向亚非各个沿海国家和地区远航的始发基地。郑和船队又在忽鲁谟斯（即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克歇姆[Qushm]岛东部的霍尔木兹[Hormoz]岛，原旧港为鹤秣城，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忽鲁谟斯为建于岛上的新港）和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建立了地处西亚

① 葛剑雄：《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中国文化》2004年第1期，第15～18页。

② 葛剑雄：《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中国文化》2004年第1期，第15～18页。

③ 陈晓珊：《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航海指南的变迁》，《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第63～68页。



和东非沿岸的两大航海贸易基地,以占城和古里为东西方贸易的大本营。郑和航海通过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这种战略布局,在较前更大的范围内适应了海外各国各地区对经济利益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依托着海洋交通中心站、航海贸易基地和贸易大本营所构建的贸易网络;郑和远航非洲将东非木骨都束、卜刺哇、竹步、麻林、慢八撒等地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空前加强了东非沿岸各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作用,促进了亚非之间海洋交通运输和贸易事业的发展,较之历代更显示出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意义<sup>①</sup>。

### (五) 饮食保障

在茫茫无涯的大海中,郑和七下西洋要解决饮食保障问题,这是保证船员身体健康的先决条件。姜聪颖、张龔真认为:据历史记载,在距郑和下西洋约一百年后的1521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麦哲伦带领200多名船员开始环球旅行,除去部分船员内部自相残杀外,其余船员多死于坏血病,最后仅有18人存活。航行船只经过热带国家时,因气候炎热、水源不洁、医疗体系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下船船员易感染黄热病、疟疾等高危性传染病等。航行风险巨大,若稍有不慎,将会造成严重的疾病隐患,后果不堪设想。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文献中,却没有船员大量死亡的记载,这与郑和背后强大的医学团队和医疗技术支撑有着紧密的关系<sup>②</sup>。

章乐绮认为: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永乐)敕书中所述盐、酱、茶、油、酒之外,尚应包括饮用水以及不易变质的干货类,如:米麦等谷类、豆类、菜干、果干、鱼干,腌制的肉类水产。至于新鲜蔬果,需为耐存放而且是停泊港口当地当季出产的为主。……出海之后,水产类可就地捕捞可以船舱中之水柜养鱼,蔬菜或小型的禽畜可在船上栽种养殖。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描写14世纪上半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其船员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但船上的产量毕竟有限,大量的新鲜蔬果、肉类及饮用水,势必待上岸时补给,尤其是淡水不可或缺<sup>③</sup>。

笔者认为,其实坏血病虽然以疾病的面目表现出来,但它完全是一个饮食问题,可以通过饮食保障予以预防和解决,即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郑和解决这一问题目前虽然很少有历史资料佐证,但是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饮食大国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推断出郑和在航海过程中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可以在船上以黄豆、绿豆等豆类来发豆芽、做豆腐、磨豆浆。豆芽、豆腐、豆浆富含维生素C,是治疗坏血病的特效药,黄豆、绿豆等豆类便于

① 郑闻天:《论郑和航海时期的中国海洋外交》,《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第114~123页。

② 姜聪颖,张龔真:《郑和下西洋与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2期,第58~64页。

③ 章乐绮:《郑和远航饮食考》,载王天有,徐凯,万明编:《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大量携带，耐长期贮存，是在大海上实现蔬菜自给自足的优秀方案，由于太常见，所以历史资料中很少记载。其次，郑和的海船体型巨大，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完全可以在船上装土种菜，虽然数量不足，但是结合黄豆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给。同时，途中补给也可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笔者认为，这也是今后郑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即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找出古人远行特别是在海洋、沙漠中远行解决新鲜蔬菜补给问题的资料，以此为佐证来反推郑和是如何解决海上给养的问题以保证海员健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六）心理健康防治

郑和七次下西洋，面临的是广阔无垠的大海，滚滚而来的浊浪以及各种热带、亚热带的致命传染病，如何使随行人员从心理上克服对这些困难的畏惧情绪，顺利完成使命，是郑和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崇拜神灵成为优选项。黄婕、黄瑞认为：永乐三年（1405）郑和使归，上奏“天妃多护庇感应”，于是，永乐帝诏令在南京龙江关建天妃庙，每年正月十五与三月二十三日，遣使致祭。据杨斌在《明代南京宝船厂中的妈祖庙》一文中介绍：“娘娘宫很大，房屋有数十间，大殿、藏经楼俱全，殿前有跑马场，庙中有花园。”……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后，有感于妈祖的灵应上奏明成祖，明成祖下诏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同时在南京城内狮子山下仪凤门外，建造了南京天妃宫，还赐炉斗、祭皿、衣服，同怀裔乐钞五百贯。（下西洋途中，郑和分别到过湄洲、长乐、泉州、东山、上海、海南、台湾等地的妈祖庙……从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代，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都建有妈祖庙。在清代，则有更多的民众跨出国门，漂洋过海到更多的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或经商，他们把妈祖文化带到了所在国。史料表明，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妈祖文化的印迹，因此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的世界性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sup>①</sup>。

笔者认为，关于从心理上探讨郑和七下西洋的论文目前少见。其实宗教崇拜并非完全是迷信行为。在科学技术不很发达的古代，这是古人应对眼前困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郑和七下西洋离不开妈祖以及其他宗教信仰，他所到之处对于宗教寺庙首先进行拜谒，热衷于建庙，是为了宽慰远离祖国的将士之心，让他们从心理上解除航海恐惧，得以完成使命。这应该成为郑和研究的新方向，可以从中开辟出郑和研究的新领域。

<sup>①</sup> 黄婕，黄瑞国：《郑和下西洋与妈祖文化传播》，《妈祖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第8～22页。